

JURENZISHU



# 巨人自述



戈尔巴乔夫自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戈  
尔  
巴  
乔  
夫  
自  
述

告苏联公民书 .....	( 1 )
第一章 当选苏共中央书记 .....	( 5 )
第二章 往事藏在我心中 .....	( 26 )
第三章 苏联总统 .....	( 38 )
第四章 党和它的变革 .....	( 56 )
第五章 新思维及对外政策 .....	( 73 )
第六章 德国得以统一 .....	( 114 )
第七章 社会主义与改革 .....	( 147 )
第八章 八月政变 .....	( 155 )
第九章 最后的努力 .....	( 193 )
第十章 新苏联的解体 .....	( 220 )
附 录 戈尔巴乔夫传记 .....	( 241 )

## 告苏联公民书

苏联总统的电视演说 1991年12月25日

“亲爱的同胞们：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的。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拥有主权。但同时又主张维护联盟国家和国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主张国家肢解、国家分离的路线占了上风，这是我无法同意的。即使在阿拉木图会晤和会晤通过决定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始终没有改变。

另外，我确信如此重要的决定本应在人民表达意志的基础上作出。尽管如此，我将竭尽所能，以使所签署的协议导致社会的实际和谐、减轻摆脱危机和改革过程的困难。

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我认为有必要说出自己对1985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更何况这方面有不少无法自圆其说的、肤浅的、不客观的见解。

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是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愈来愈落在他们的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精疲力尽。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

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正因如此，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有仅仅为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的和不道德的。我明白，开始一场如此规模的改革而且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那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冒着风险的事情。然而我却至今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

国家复兴和国际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不过业已完成的事情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

——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我们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因此也尚未学会利用自由。尽管如此，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

——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

——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内农民阶级得到复兴，出现了私人农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农村居民、市民使用。生产者的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家活动、股份制、私有化方兴未艾。

——在将经济转向市场时，必须记住这是为了人。当此困难时期一切均应从人的社会保障出发，这特别与老人和儿童有关。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

——已经结束‘冷战’，曾对我国经济、社会意识和道德起破

坏作用的军备竞赛和国家极度军国主义化已经停止。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解除。

我想在此再次强调，我在过渡时期将竭尽全力，继续对核武器进行可靠的监督。

——我们已经对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并放弃在国  
外使用武力。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信任、团结一致和尊重。

——我们已成为按照和平、民主原则重建现代文明的主要  
支柱之一。

——各国各族人民均已获得选择其自决道路的实际自由。  
对多民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已接近于签署一项新  
的联盟条约。

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都是在尖锐的斗争  
中进行的，都曾遇到旧的、过时的、反动的是力日益严重的反抗，  
这里既有过去的党和国家机构和经济结构，也有我们的习惯、思  
想偏见、平均主义和坐享其成的心理。这些变化遇到了我们的  
偏执、政治文化水平低下、对变革的恐惧心理。因此我们才损失  
了许多时间。旧体制瓦解之时，新体制尚未开始运作。于是社  
会的危机更加深重。

我知道对目前严重局势的不满情绪，知道对各级行政当局  
和对我本人活动的尖锐批评。不过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在我们  
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又拥有如此遗产的国家里，根本性变革不可  
能在毫无痛苦、毫无困难和动荡的情况下进行。

八月政变使总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中最致命的是国家  
的解体。今天我所担心的是我国的人们失去伟大国家的国籍  
——对每个人说来后果都将十分严重。我认为保住近年来的民  
主成果至关重要。那都是通过我们的整个历史、我们的痛苦经

验获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将化为泡影。这一切我都是直抒胸臆，如实道来。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革新政策、参与实施民主改革的公民表示谢意。我要感谢国外那些懂得我们的意图并予以支持、协助我们并与我们真诚合作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数以千百万计的人们。

我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不过同时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我们是伟大文明的继承人，如今伟大文明能否振兴，我们能否过上现代化的名副其实的新生活，完全取决于大家，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衷心感谢那些近年来与我一起坚持正义而美好的事业的人们。也许某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许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国各族人民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

祝大家万事如意。”

## 第一章 当选苏共中央书记

1978年,11月27日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治生涯中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我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

### 出乎意料之外的聚餐结局

11月25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点,我来到既是老乡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好,当天他过50岁生日。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住宅里聚集了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另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不例外。50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任”。有时就会这样的问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

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查明戈尔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把我拉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午便把电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你打错电话了。”……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找你。差点把我们都给开了……”“好，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办公室，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说说话……”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

### 语重心长的祝愿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然而这次谈话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说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人怀有



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

“得了吧你！打了 23500 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 1978 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 怎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尽，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当夜，我无法入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

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作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H.И. 萨温金对我说,是A.П. 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萨温金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

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我对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对方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担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找到了公开陈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也不少。

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仅仅限于交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我说。“经营不善、亏损的农庄多给;搞得好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或者破产,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你真聪明,”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这边俄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摆荒。得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可‘采取措施’，‘拯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正常，结果却很差，土地摆荒。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活口……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1965年三月全会感到自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是你欠债……什么全颠倒了……”

库拉科夫的反应特别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拖拉机，搞收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却不让他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当。他连组员都不是。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参与了破坏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

“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П.М.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心：哪怕以“压缩”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的Л.Я.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

“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议有

些话不要讲的。主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1978年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边，它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还有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级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年7月库拉科夫猝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地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

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

### 安德罗波夫“问题”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没有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

“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問得有些離奇不離奇？”對我的“晴天霹靂”習慣了的安德羅波夫大感不解地答道。

“再有三五年，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陸續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已經時日不多……”

應當說，當時在年齡方面政治局內的形勢相當緊張：平均年齡接近70。人們感到厭煩的是，其中許多人並無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於自然規律的關係已不能履行職責。儘管如此，至今他們全都占着位子不下來。

安德羅波夫大笑：

“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過這個問題可是得考慮了。您看看吧，書記的情況也一樣，還有地方上……”

安德羅波夫開始講他的觀點，按照這個觀點，如果提拔上歲數的人，這樣的人已有經歷，也有經驗，卻沒有野心。工作起來沒有任何向上爬的派頭。而所有的年輕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簡言之，這個觀點的實質是：“老馬不毀莖。”

我開玩笑地反駁道：

“這可是列寧幹部學說的新發展。我一直以為任何時候都必須搞新老幹部結合。這樣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險主義，又可以防止停滯不前和保守主義。”

“這都是理論，生活中不是這麼回事。”安德羅波夫不以為然。

“反正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列寧的意見。”我狂熱地堅持。

“我也同意列寧的意見。”安德羅波夫嘲諷地說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寧……您記得嗎，民間有個說法，叫做：哪個林子下面不帶小灌木叢。”